



上海市律师协会
公司与商事专业委员会

公司与商事实务前沿

(2025 年 3 月，第三期)

编委会

主 编：王竞

副主编：张政、李慧琴、邓海虹

责任编辑：车丽、何莹

目 录

一、 新法速递	1
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本规则》	1
司法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就《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修 订答记者问	5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8
二、 观点速递	15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办理指引之十一 股权转让纠纷—摘自“北 京二中院金色天平”微信公众号	17
法言 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应重视—摘自“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30
三、 实务研究	33
股东有权基于公司与相对人签订的仲裁协议提起代表仲裁吗？ 至 正-案例分析—摘自“上海二中院”微信公众号	33
吴慧琼：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问题解析 衡石·观点—摘自 “上海一中法院”微信公众号	38
四、 实务论道	46
新《公司法》下股权转让人的注意义务边界探析	46

一、新法速递

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本规则》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国证监会 2024 年第 3 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2025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令第 225 号公布，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裁量工作，统一执法尺度，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是指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决定是否给予处罚、给予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裁度、衡量过程。

第三条 行政处罚裁量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相当。

第四条 行政处罚裁量应当综合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等因素，确保处罚必要、适当，并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众合理期待。对同一时期类别、性质、情节相似的案件，处理结果应当基本均衡。

第五条 行政处罚裁量分为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以下进行处罚，或者减少并处的处罚种类。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以内，给予较轻的处罚。

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以内，给予较重的处罚。

一般处罚，是指除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外，不存在本规则规定的从轻或者从重处罚情形的，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以内，给予适中的处罚。

第六条 对罚款有一定幅度的，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以内，划分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

（一）从轻处罚阶次，在法定最低罚

款金额以上（没有法定最低罚款金额的除外）、法定最高罚款金额 30%以下给予罚款；

（二）一般处罚阶次，在法定最高罚款金额 30%以上、60%以下给予罚款；

（三）从重处罚阶次，在法定最高罚款金额 60%以上、法定最高罚款金额以下给予罚款。

在确定裁量阶次时，根据不同违法行为为类型的性质、构成、特点等情况，可以以前款规定的百分比为基础上下浮动十个百分点。

对依法应当采取证券、期货市场禁入措施、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给予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罚款等行政处罚种类的，参照前两款规定的原则划分裁量阶次。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其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

第八条 违法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违法的单位被撤销、注销的，免于处罚。违法的单位被撤销、注销的，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仍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

（一）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二）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三）单位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案发前主动举报单位违法行为，并且积极配合查处；

（四）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五）其他依法减轻处罚的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处罚：

（一）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三）主动供述监管机构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四）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五）其他依法从轻处罚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罚：

- （一）对资本市场秩序影响较小；
- （二）对资本市场投资者、交易者权益损害较小；
- （三）主观过错较小；
- （四）如实陈述，积极配合查处；
- （五）对违法事实没有异议，签署认错认罚具结书；
- （六）其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 （一）严重违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稳定，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严重危害金融安全；
- （二）严重损害资本市场投资者、交易者权益，影响恶劣；
- （三）实施违法行为，涉及行贿或者受贿情形；
- （四）殴打、围攻、推搡、抓挠执法人员，造成执法人员人身损害，或者限制执法人员人身自由；
- （五）毁损、伪造、篡改证据材料；
- （六）转移、变卖、毁损、隐藏被依法冻结、查封、扣押、封存的资金或涉案财产；

（七）因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后五年内，再次实施同一类型违法行为；

（八）其他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 （一）违法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社会危害较大；
- （二）主观过错较大；
- （三）侮辱、谩骂执法人员；
- （四）抢夺、毁损执法装备及执法人员个人物品；
- （五）抢夺、隐藏证据材料；
- （六）未按照要求提供涉案文件资料，且无正当理由；
- （七）躲避推脱、拒不接受、无故离开等不配合执法人员询问，或在询问时故意提供虚假陈述、谎报案情；
- （八）其他依法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因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六项、第二款第三项至第七项所涉行为已被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的，该行为不再作为从重处罚情节。

第十二条 当事人同时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后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是指通过违法行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予以认定。

第十四条 两个以上当事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应当将所有当事人作为一个整体，认定主观过错、违法行为和违法所得。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认定构成共同违法，依法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的，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中明确各当事人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金额。

第十六条 单位实施违法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从以下方面考虑该人员与案件认定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认定：

- （一）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 （二）职务及履行职责情况；
- （三）知情程度；
- （四）知情后采取的行动；
- （五）其他影响责任认定的情节。

第十七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当事人有多个独立违法行为，均给予罚款的，罚款数额累计计算。

第十八条 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已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十九条 违法行为始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修改生效之前，终于修改生效之后的，适用新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适用本规则可能出现明显不当、显失公平，或者本规则适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适用的，应当经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批准或者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照规定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行为同时构成民事侵权的，依法配合做好民事责任追究。

依法不予处罚的，可以根据情节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通知自律组织依法采取纪律处分等自律管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时已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的，移送文书中应当写明没收违法所得、
缴纳罚款情况。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被处罚金后，对
该违法行为还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再
给予罚款。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进行
处罚。

第二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对派出机
构行使处罚权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中下列用语的
含义：

“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是指当事人
受到他人威胁，迫于精神上的强制而实施
违法行为，或者受到引诱、欺骗，因被蒙
蔽而实施违法行为。

“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是
指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
合法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或者被引诱、欺
骗而产生重大认识错误，导致违法行为发
生。

“立功”是指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
罪行为或者提供查处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
经查证属实。

“重大立功”是指检举、揭发他人重
大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提供查处其他重大案

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司法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就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修 订答记者问

2025 年 3 月 17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
署第 802 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保
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日前，
司法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就《条例》
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修订
背景。**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拖
欠企业账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
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解
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拖欠企业账款清偿
法律法规体系。现行《条例》自 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以来，对依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切实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受国内外复杂形势影响，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账期拉长，“连环欠”现象较为突出，《条例》实施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工作机制不健全，部门职责不够明确，监督管理措施不够完善；二是相关主体的支付责任不够具体，保障措施不够有力；三是有些制度措施比较原则，法律责任不够健全。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条例》作出修订。

问：修订《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本次《条例》修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总体思路上主要遵循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三是坚持防治结合，强化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款项支付责任，完善保障支付各项措施，加大预防和治理拖欠力度。四是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政府和市场、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尊重交易主体意思自治，依法依规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并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做好衔接，形成制度合力。

问：为加强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确立了哪些工作原则和体制机制？

答：一是增加规定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应当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坚持支付主体负责、行业规范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的原则。二是明确国家和地方层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和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金融管理、国有资产监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工作职责。三是强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负总责，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健全制度机制。四是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通过监督检查、函询约谈、督办通报、投诉处理等措施，加大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清理力度。

问：《条例》在规范支付行为、强化支付责任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条例》设“款项支付规定”专章，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修订：一是进一步明确付款期限。明确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的款项支付期限要求，特别是规定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应当按照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不得约定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企业支付款项的条件或者按照第三方付款进度比例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二是进一步完

善非现金支付方式。明确规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三是明确对无争议款项的付款义务。增加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小企业的交易，部分存在争议但不影响其他部分履行的，对于无争议部分应当履行及时付款义务。

问：《条例》在强化各级政府部门监督管理措施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答：《条例》设“监督管理”专章，推动建立相关制度，主要作了以下修订：一是明确定期工作汇报制度。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应当每年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向其主管部门或者监管部门报告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情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定期听取本行政区域内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汇报。二是建立约谈通报制度。明确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严重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情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函询约谈、督办通报等措施。三是进一步细化限制措施。明确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对机关、事业单位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对大型企业在财政资金支持、投资

项目审批、融资获取、市场准入、资质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

问：《条例》对投诉处理机制作了哪些修改完善？

答：投诉处理机制是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的一项重要举措，《条例》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修改完善：一是明确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建立国家统一的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二是明确相关时限，受理投诉部门应当自正式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处理投诉部门应当在 30 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投诉人，情况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的，处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90 日。三是明确受理投诉部门、处理投诉部门、投诉人、被投诉人等各主体的权利义务。

问：《条例》在强化实施保障方面还有哪些新规定？

答：一是强化法律责任。《条例》设“法律责任”专章，明确国有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恐吓、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补充完善了相关法律责任。二是加强行业自律。要求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

询、权益保护、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服务；鼓励大型企业公开承诺向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的付款期限与方式。三是增加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引导、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降低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合同、存货、机器设备等为担保品的融资提供便利。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2020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28 号公布 2025 年 3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802 号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中小企业，是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所称大型企业，是指中小企业以外的企业。

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依合同订立时的企业规模类型确定。中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应当主动告知其属于中小企业。

第四条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应当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坚持支付主体负责、行业规范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的原则，依法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国务院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金融管理、国有资产监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相关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负总责，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健全制度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和发展改革、财

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金融管理、国有资产监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相关工作。

第六条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加强行业自律管理，规范引导本行业大型企业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服务，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鼓励大型企业公开承诺向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的付款期限与方式。

第七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中小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合格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第二章 款项支付规定

第八条 机关、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无预算、超预算开展采购。

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

垫资建设。

第九条 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

大型企业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应当按照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不得约定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企业支付款项的条件或者按照第三方付款进度比例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本条第一款、第二款付款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合同约定采取履行进度结算、定期结算等结算方式的，付款期限应当自双方确认结算金额之日起算。

第十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货物、工程、服务交付后经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作为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条件的，付款期限应当自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合同双方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明确、合理的检验或者验收期限，并在该期限内完

成检验或者验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检验或者验收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延检验或者验收的，付款期限自约定的检验或者验收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第十一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第十二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除依法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工程建设中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其他保证金。保证金的收取比例、方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将保证金限定为现金。中小企业以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提供保证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接受。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依法

或者按照合同约定，在保证期限届满后及时与中小企业对收取的保证金进行核算并退还。

第十四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备案、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第十五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交易，部分存在争议但不影响其他部分履行的，对于无争议部分应当履行及时付款义务。

第十六条 鼓励、引导、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降低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合同、存货、机器设备等为担保品的融资提供便利。

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融资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自中小企业提出确权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第十七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

第十八条 机关、事业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度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通过网站、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大型企业应当将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纳入企业年度报告，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十九条 大型企业应当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情况，纳入企业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体系，并督促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第二十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提出付款请求或者投诉的中小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恐吓、打击报复。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通过监督检查、函询约谈、督办通报、投诉处理等措施，加大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清理力度。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应当每年定期将上一年度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情况按程序报告本级人民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应当每年定期将上一年度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

项情况按程序报其主管部门或者监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定期听取本行政区域内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汇报，加强督促指导，研究解决突出问题。

第二十三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督查制度，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可以进行函询约谈，对情节严重的，予以督办通报，必要时可以会同拖欠单位上级机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联合进行。

第二十四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以下统称受理投诉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

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建立国家统一的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加强投诉处理机制建设，与相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信息共享、协同配合。

第二十五条 受理投诉部门应当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自正式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有关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处理投诉部门）处理。

处理投诉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形成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投诉人，并反馈受理投诉部门。情况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的，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处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90 日。

被投诉人应当配合处理投诉部门工作。处理投诉部门应当督促被投诉人及时反馈情况。被投诉人未及时反馈或者未按规定反馈的，处理投诉部门应当向其发出督办书；收到督办书仍拒不配合的，处理投诉部门可以约谈、通报被投诉人，并责令整改。

投诉人应当与被投诉人存在合同关系，不得虚假、恶意投诉。

受理投诉部门和处理投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十六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依法依规被认定为失信的，受理投诉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程序将有关失信情况记入相关主体信用记录。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将相关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对机关、事业单位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对大型企业在财政资金支持、投资项目审批、融资获取、市场准入、资质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依法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情况实施审计监督。

第二十八条 国家依法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和营商环境评价时，应当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情况纳入评估和评价内容。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建立企业规模类型测试平台，提供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服务。

对中小企业规模类型有争议的，可以向主张为中小企业一方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申请认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统计等相关部门应当应认定部门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三十条 国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存在支付纠纷的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公益宣传，依法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行为的舆论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机关、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中小企业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二）拖延检验、验收；

（三）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或者利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四）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

（五）违法收取保证金，拒绝接受中小企业以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提供保证，或者不及时与中小企业对保证金进行核算并退还；

（六）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备案、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

业款项；

（七）未按照规定公开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

第三十二条 机关、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责任：

（一）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未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二）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

第三十三条 国有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国有大型企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由其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四条 大型企业违反本条例，未按照规定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提出付款请求或者投诉的中小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恐吓、打

击报复，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财政资金的团体组织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

付中小企业款项，参照本条例对机关、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军队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按照军队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二、观点速递

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为由确定管辖法院的界定标准——摘自微信号“山东高法”

作者：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昱鑫、万又铭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纠纷管辖类案件中，该条款的适用比例较高。然而，关于此条款中“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界定标准，《解释》并未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由此，会产生以下种种疑惑：“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是否仅为债权人所在地，出借方所在地的法院是否有管辖权？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合同违约金或是要求双倍返款定金时，此时诉请所涉及的标的物是应当界定为

“争议货币”还是“其他义务”？若当事人对合同约定需要交付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存有瑕疵，且对给付对价本身的金额判定存有异议，此时是否仍宜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法院？

笔者认为，对于“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判定，由于其合同关系主要所指向的是“金钱债权债务关系”，故可先将案涉合同进行类型化区分为“借款合同”和“借款合同以外的其他合同”后，再单独分类别明确界定标准更为适宜。具体如下：

1. 若案涉合同关系为借款合同的，合同关系中涉及的出借方负担交付借款款项义务，借款方需履行按期返还欠款之义务。由此可知，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有成为“接收货币一方”的可能，即其所在地亦有可能作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同时，实际交易中，债务双方当事人并非“一成不变”，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转移之情形。据此，可将借款合同纠纷中的“接收货币一方”进一步细化为五种情形。

第一种为“借款交付”，即借款合同达成后，因出借方未交付借款，借款方起诉要求出借方依约发放借款的，此时争议标的应为出借方负担的交付借款之义务，接收货币一方应认定为是借款方，故借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二种为“欠款收取”，即借款方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出借方诉请要求返还本金及利息，争议标的应为借款方还款义务，接收货币一方应判定为是出借方，出借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三种为“债权转让”，即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借款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新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由新债权人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种为“债券交易”，即公司债券交易中，债券受让人诉请要求公司履行兑付票据本金等金钱义务时，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债券受让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五种为“打包转让”，此种情形主要集中在小额信贷过程中的债权打包移转，实践中原借款合同大多都是格式合同，且约定了管辖条款，但此时应具体判断约定的管辖法院与本案有无实际联系。若无，则该争议解决约定条款，争议标的仍为给付货币，应认定“请求支付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2. 若案涉合同关系为借款合同以外的其他合同，此处所指的“其他合同”，应为合同关系所涉内容仍为“给付货币”，反之，则不能适用前述《解释》条款，即无讨论必要。此处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为“先行支付”，即买卖合同

关系中，明确了买方负有先支付货款的义务，卖方后交付货物，若买方未按约定支付货款，卖方起诉要求买方支付货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认定卖方为接收货币一方，卖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二种为“给付对价”，即合同纠纷中，一方起诉要求另一方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付款义务的，争议的合同义务是以给付货币，即给付对价为内容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若原告的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金钱，并不是案涉主合同义务所指向的标的，如支付违约金、定金罚则适用等非给付对价义务的，争议标的应认定为系“其他标的”，应适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

第三种为“股权转让”，即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出让方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种为“款项结算”，即案涉合同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已对合同款项进行了结算，且在诉讼期间未对案涉合同所指向的货物交付或服务提供本身质量问题提出异议，仅就款项给付与否、金额大小、利息产生争议的，此时应适用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法定条款来确定管辖法院。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办理指引之 十一 | 股权转让纠纷—摘自“北京 二中院金色天平”微信公众号

股权转让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日益成为现代交易中最重要、募集资本、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随着股权转让交易的增多，围绕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案件也层出不穷。审理该类案件时既需要立足于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也需要兼顾合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同时，案件事实较为复杂、转让主体之间约定不明确、涉及利益主体较多等因素，给案件审理带来了较大难度。我们通过调研和梳理，形成此文，以期厘清上述争议。

1 概述

1.1 概念界定

股权转让是股东与受让人意思表示一致，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将自己的股权转让与受让人，使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成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纠纷则是因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既包括股权转让合同主体之间的纠纷，也包括其他主体就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引发的纠纷。鉴于有限责任公司占据市场主体的大部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规范较为原则、有限责任公司运作不规范现象较多等因素，实践中股权转让纠纷多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以

本文将所涉股权转让纠纷限定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

1.2 诉讼类型

股权转让纠纷既包括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也包括其他主体就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引发的纠纷。后者既包括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引发的纠纷，也包括股权代持时实际出资人或者显名股东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的纠纷、股东配偶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的纠纷。

1.3 诉讼主体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诉讼主体多为股权转让双方，通常情况下以权利受损的当事人为原告，列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为被告。特殊情况下，如涉及公司利益或者为查明案件事实需要的，可根据需要追加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他主体就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引发的纠纷中，诉讼主体除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外，还包括主张优先购买权被侵犯的其他股东、出资股权被转让的实际出资人、不知晓股权转让的股东配偶等。

常见问题股权转让纠纷中当事人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能否一并处理？从《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三十二条、第八十七条，《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来看，股东发生变化，由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相应的材料申请变更登

记，也就是说申请工商登记变更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股权转让的当事人。如股权转让双方对合同并无争议，仅是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不应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解决登记问题，应以公司为被告提起请求公司变更登记诉讼。如受让人与转让人就股权转让合同产生较大争议，为减少诉累，受让人可在股权转让纠纷中解决与转让人之间的争议，同时一并请求变更登记。由于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一般为公司，所以应追加公司作为诉讼主体。至于究竟将公司追加为第三人还是被告，可视公司的陈述意见予以确定。如果公司反对原告的诉求，则列为被告；如公司不反对，则列为第三人。判项的表述应为：

“××公司在××日（具体期限视情况而定）内将转让人××名下持有的××公司股权（股权比例或出资数额要具体）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转让人××和受让人××予以协助。”需要指出的是，如转让人诉请给付款项或者解除合同，一般不会将公司列为案件当事人。该种情形下，受让人不宜通过提起反诉的方式主张变更登记问题。受让人可在与转让人的纠纷解决后，通知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如公司拒绝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可通过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解决。

2. 管辖

2.1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管辖

查明事实：1. 合同是否对管辖有特殊约定；2. 被告住所地；3. 合同履行地。

法律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

2.2 其他主体就股权转让提出异议 引发纠纷的管辖

查明事实：1. 被告住所地；2. 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

法律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

常见问题（1）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是否适用公司类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定管辖。”基于上述规定，实践中部分观点认为，在未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属于具有给付之诉性质的诉讼，该类诉讼虽然或多或少牵涉公司，但或者属于传统的民事纠纷范畴，或者虽涉及公司法上的权利义务关

系，但并不具有组织法上纠纷的性质，故从内涵而言，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引发的纠纷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纠纷不同，所以不宜根据公司类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处理管辖问题，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专属管辖、专门管辖或者地域管辖等情形下，应根据合同纠纷相关管辖规定确定管辖。

（2）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引发的纠纷应如何确定管辖？该类诉讼与公司有关，但并非关于公司的组织法性质的诉讼，也不涉及多项法律关系，对该纠纷作出的判决仅对股权转让双方、主张受侵害的其他股东有法律效力。所以针对该类案件确定管辖时，不应适用公司类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同时该类诉讼一般由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作为原告提起，股权转让双方为被告，其实质为因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所以应按照侵权纠纷相关管辖规定确定管辖。

3. 审理股权转让纠纷的常见问题

3.1 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查明事实：

1. 法律、行政法规对股权转让是否有限制性规定；2.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是否有限制性规定；3. 合同是否存在非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4. 股权转让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法律适用：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四百六十七条、第六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常见问题

（1）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均为无效？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七条对国有资产转让的具体流程进行了规定。如该国有股权转让将导致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时国有股权转让时应依法对股权进行评估，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应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如依法应办理批准手续但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 年 11 月 8 日）第 37 条对此已予以明确，该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通常情况下国有资产转让应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如未在规定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该国有资产交易是否为

正当转让存疑。《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系规制合同签订前的行为，客观上是通过在规定场所交易确保国有资产交易的程序以及价格妥当，如违反上述规定，将导致无法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故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股权转让，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应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国有股权转让未进行评估的，违反了《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五条“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的规定，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同时结合《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违反强制性规定并不无效的除外情形规定，如认定违反评估程序的合同有效，将导致涉及国家利益的合同主体一方利益无法实现，将影响评估规定的规范目的实现。但在能够保证国有权益并未因转让股权未进行评估而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未经过评估程序可不作为导致合同无效的理由。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未经配偶同意即转让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而登记在己方名下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因此无效？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在公司中享有的复合性权利，包括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和担任选择管理者等，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属性。根据公司法规定，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应同时符合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这一实质要件和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等相关要件这一形式要件。换言之，出资并非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充分条件，不能仅因为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当股权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时该股权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股东有权单独处分该股权。如无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因转让该股权而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配偶有证据证明受让人与转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该配偶有权依法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股东进行涉及较大财产价值的股权交易时，因该行为对股东配偶有较大影响，所以配偶应配合出具同意出售的声明。如股东配偶在股权交易未完成时，其明确向股权转让受让人表示不同意履行该交易，我们倾向认为，可以由股权转让受让人向转让股东主张赔偿责任，而股权转让合同不宜继续履行。

（3）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即

将名下股权对外转让，该转让股权合同是否无效？

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代持，虽然名义股东可以对外行使股东权利，但因该股权取得之出资由实际出资人进行，所以不宜认定名义股东可以擅自处分该股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明确，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名义股东擅自处分时，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善意取得规定处理。善意取得制度在股权转让领域的适用，应建立在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无效但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认定前提，如果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无效事由，则无参照善意取得规定处理的必要。所以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对外转让股权，不导致转让合同无效，但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一方面，如股权受让人明确知晓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股权代持约定，但仍在未取得实际出资人同意情形下受让股权，股权受让人不构成善意取得，其权利无法对抗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如股权受让人不知晓股权代持事宜，在股权并未转移至股权受让人时，实际出资人可向股权受让人主张权利，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不能要求合同继续履行，但股权受让人可向名义股东主张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如交易相对方已善意取得转让的股权，实

际出资人无法行使追回权，其可以向名义股东主张赔偿责任。

（4）瑕疵出资股权转让时合同是否无效？

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根据受让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来处理，即以转让人对受让人是否构成欺诈确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转让人隐瞒出资瑕疵的事实，受让人亦不知情，受让人有权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当然行使撤销权应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如受让人知晓出资瑕疵仍自愿与转让人签订合同，则受让人无权撤销合同，还可能会与转让人一同向公司承担出资不实责任。

《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八十八条对因出资引发的股权转让双方责任承担问题进行了规定。在瑕疵股权转让不导致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况，如受让人不知晓转让人未按照章程规定实缴出资或者不知晓转让人以非货币方式出资时存在未足额实缴出资，受让人可不与转让人一并承担责任。

（5）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无效？

《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 年 11 月 8 日）第 9 条规定系在实

际上对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转让股东和股权受让人三方的利益进行同等保护。一方面，如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在符合规定时，可予以支持；另一方面，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当然因侵犯优先购买权而无效，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认定该转让合同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履行，股权受让人可要求股权转让承担违约责任。基于上述规定，其他股东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诉求，也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擅自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可予以支持。

（6）公司章程限制或禁止股权转让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八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基于上述规定，应认定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进行合理限制，这属于公司自治的体现。但公司股权为股东的财产权利，公司章程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损害股东的合法权利。换言之，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进行合理限制，

但不得绝对禁止或通过其他约定变相禁止股权转让、实质上禁止股权转让。如公司章程进行了上述规定，其损害了股东的合法权利，应认定为无效。

（7）股权转让中“阴阳合同”的效力？

出于规避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逃避国家税收以及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等目的，交易双方会在股权转让时就同一交易事项签订两份甚至两份以上的交易条件不一致的合同，其中，记载双方真实交易条件并作为双方履约依据的合同为“阴合同”，交易条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出示给相应国家机关进行备案或作为缴纳税款等依据的合同为“阳合同”。就上述“阴阳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认定“阳合同”属于《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该通谋实施的虚假意思表示无效；“阴合同”体现的是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效力应依据该行为自身的效力要件依法认定，不应不加限制地一律否定或承认其效力。

（8）涉外商投资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

外商投资者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商投资者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要求，才可以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

如果违反规定，境外注册成立的公司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投资的领域，那么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

3.2 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中

违约、解除等问题

查明事实：

1. 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2. 当事人就各自义务的履行情况，未履行时是否存在正当理由；3. 是否存在客观不能履行的情形；4. 合同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权条件是否成就。

法律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至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八十条、第五百九十五条至六百四十六条。

常见问题

（1）股权变更时间节点如何确认？

依据《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五十六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 年 11 月 8 日）第 8 条规定，股权转让合同中的受让人以其姓名或名称记载

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已取得股权的，应依法予以支持。换言之，股权变动生效的节点以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为准。当然，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后，仍应要求公司为其办理工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实践中，存在股东名册不规范的情况，有关公司的文件如公司章程、会议纪要等，只要能够证明公司认可受让人为股东的，都可以认为产生股东名册变更的效果，在公司内部，应认定受让人为股东。受让人通过上述方式实际取得股权后，可以对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股东会会议。

（2）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制度能否适用于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

《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规定了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分期付款买卖一般发生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出卖人大多数情况下已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但买受人尚未能支付全部款项，出卖人在价款回收上存在一定的风险。相反，涉分期付款买卖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即使转让人已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变更登记，作为转让标的物的股权仍存于公司，仅有公司经营管理之好坏能够影响股权价值之高低，所以转让人一般不存在收回价款的风险。同时，一项股权交易，关联诸多方面，如其他股东对受让人的接受和信任，记载到股东名册和工商部门登记股权，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发生。从维护

交易安全的角度，动辄解除合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有不利影响。基于此，如受让人不构成根本违约或者未出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不宜依据《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确认转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7号（即（2015）民申字第2532号案）对上述规则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该案裁判要旨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中发生股权受让人延迟或拒付等违约情形，股权转让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不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合同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即可解除合同的规定。

（3）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人对公司财产存在虚假陈述，应如何处理？

股权转让不涉及物的转让，不存在标的物品质量问题，但仍可能存在价值减少的问题。如转让人对公司财产存在虚假陈述，则对应公司财产的股权价值将难以得到保证。受让人即使受领了股权，也会因公司财产与转让人陈述不一致对股权价值有所影响，此时应认定转让的股权存在瑕疵，但该瑕疵并非权利担保中的第三人主张权利情形，而是股权交换价值的减少，应属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存在上述情形，股权受让人可要求转让人减少转让价款或

者承担违约责任。但转让人对受让人所作虚假陈述导致受让人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时，受让人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

（4）股权转让中，买受人对目标公司的债务及担保情况负有谨慎注意的义务，应以何种标准审查买受人的上述义务是否已履行完毕？

如果股权转让人在移交资料中已经披露债务及担保情况，受让人接收后并未提出异议的，应认定其知晓公司债务情况。双方基于转让人披露的公司状况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在此情况下受让人在受让股权后再以转让人隐瞒重大债务为由要求解除协议或赔偿，缺乏依据。如股权转让双方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的基础产生争议，双方亦未就目标公司的债务及担保情况的披露具体过程签订确认文件，受让人以转让人未能如实披露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一般不予支持。

（5）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导致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

股权受让人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转让股东应通知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待受让人被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公司文件显示公司认可该受让人为公司股东后，受让人即成为公司股东。如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人为受让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转让人应积极通知公司办理股权变更

登记手续，公司拒不办理时转让人或者受让人均可以起诉公司。我们倾向认为，除非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否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足以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转让股东同意配合办理的情况下，受让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

（6）目标公司已注销或破产，违约方以无法履行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能否得到支持？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是关于陷入合同僵局违约方可解除合同的相关规定。因目标公司已注销或破产，就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已存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且无法强制履行，故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应予解除，但不影响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承担。关于损失赔偿一项，如违约方系转让人，则可将守约方已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作为损失赔偿考量范围。如违约方系受让人，因违约方应依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对价为受让股权，但因目标公司注销或破产，已无法取得股权，故在此情况下，不宜将等额股权转让款作为损失进行考量，而是应根据守约方付出的相应成本、目标公司注销或破产的原因等因素综合酌情予以认定。

（7）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转让股权是

否应予返还？

关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应否恢复原状，应当从商事交易的特殊性角度出发，从严把握解除权和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在考量股权转让合同应否恢复原状时需要考虑公司的状况，顾及公司的稳定性和人合性特征，而不是合同解除后必须恢复原状。如不宜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解决双方纠纷，可通过赔偿损失来解决。

当然，如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产生的时间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相隔较短，公司生产经营、股权价值未发生重大变化，可判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

（8）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受领股权后已将股权再次转让，其能否以转让人抽逃出资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受让人已将股权对外转让，一方面，应认定其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另一方面，其在合同解除后客观上亦无法将股权返还给转让人。所以如受让人与转让人明确约定转让人应保证注册资本实缴的情况下，受让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在转让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可要求转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关于原股东在持股期间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亦可追究原股东责任。

（9）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的原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问题？

股东出资认缴制下，未届认缴期限的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是股东不得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股东在知道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转让股东应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践中，关于判断股东滥用期限利益转让未届认缴期股权的标准，可以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判断：第一，股权转让时间。如转让股权时公司债务是否已经形成，是否处于诉讼期间或者已经处于执行程序当中。第二，公司资产是否不足以清偿债务。股东转让股权时是否知道、应当知道或者应当预见到公司资不抵债、已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形。第三，转让行为是否符合市场交易规律。转让股权是否约定对价、对价是否合理，转让股权后是否交接公章、证照等材料，是否告知公司资产、债务等情况。第四，其他因素。例如，受让股东是否具备出资能力、偿债能力和经营能力，受让后是否有实际参与经营活动；再如，原股东是否仍实际控制公司等。

《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五十四条和第八十八条进行了明确规定，一方面，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另一方面，受让人未按期足

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应就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所以，股权转让前转让人认缴出资部分未进行实缴或未能全部实缴时，无论转让人是否存在逃废债的故意，只要受让人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无法履行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那么转让人就需要对其转让未实缴出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相较于此前的司法实践认定，《公司法》（2023年修订）的规定加重了转让人在股权转让时的审慎义务，也明确转让人的责任劣后于受让人的责任，但并未明确转让人恶意转让时的责任承担规则。在尚未有明确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时，我们倾向认为，沿用此前关于恶意转让的认定思路，当认定转让人恶意转让股权时，依据共同侵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判令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方式，是按照入库原则向公司支付出资款还是按照直接清偿原则向债权人支付，在出台司法解释等明确意见前，我们倾向于参考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则，由未出资股东向债权人直接支付。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有权要求股东提前出资，但公司怠于向股东主张时债权人可以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此时便与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有高度重合，同时直接清偿也有利于提高债权人的积极性。当然，如

果其他债权人也向股东主张权利，发现包括股东出资在内的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公司到期债务时，在后主张债权人可申请公司破产避免己方得不到受偿。

（10）转让人未结清转让前公司债务，是否需要向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各方对转让前后的债务承担，股权转让双方应依约履行。债权人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时，受让人以其与转让人的约定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如股权受让人在受让后发现公司需负担转让前未结清的债务，可向转让人主张违约责任。违约赔偿责任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可通过股权受让人股权比例、股权转让金额等因素综合确定。实际损失可参照下述公式确定，即实际损失=隐瞒债务的数额×股权转让价格/双方确定公司的总资产数额。

3.3 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的 相关问题

查明事实：

1. 原告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2. 原告是否存在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3. 原告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否具备可履行的条件；4. 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5. 其他股东知晓同等条件的时间或者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

法律适用：

《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二条。

常见问题

（1）其他股东如何保障自身权利？

其他股东如认为转让股东损害其优先购买权，首要救济方式应当是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如其他股东仅是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而未同时要求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当然有可能转让股东没有通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事宜，其他股东如未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主张，则相关权利得不到法院支持。如股权变更至受让人名下到其他股东发现的时间已超过一年，其他股东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但不影响其因优先购买权无法行使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如股权受让人起诉股权转让配合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时，其他股东知晓该诉讼后主张优先购买权，应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并同时主张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在知晓上述诉讼后，不宜再另案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需要注意的是，如转让人之外的一位

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可向转让人了解其是否通知全部股东，法院亦可以通知其他股东到庭说明情况。如其他股东亦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可在征求现有原告的意见后，追加其他股东为共同原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2）转让股东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如何认定？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未通知其他股东，属于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股东名义上以较高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非股东主体，实际上却以较低的价格与非股东主体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亦可认定为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股东首次转让部分股权时以较高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非股东主体，客观上阻却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较短时间内再次转让剩余股权时却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此前受让股权的非股东主体，亦可认定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

（3）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转让股东能否放弃转让？

除非公司章程和全体股东有其他约定，转让股东一般可以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放弃转让。如转让股东多次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放弃转让的，既有可能因为滥用权利而导致反悔权被给予否

定性评价，也需对因反悔行为导致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因继承、离婚等事由发生的股权转让，其他股东能否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九十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自然人股东死亡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各股东基于人合性考虑完全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继承人可取得股权对价而非直接继承股权。如公司章程中未进行限制，我们认为其他股东不得因优先购买权而限制死亡自然人股东的继承人通过继承方式取得公司股权。

除了继承这种情形外，在公司章程未进行限制时，公司法并没有明确在以非交易的方式将股权由现股东名下转移到非股东主体名下时其他股东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有观点认为，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仅在股权因交易产生转让时才产生，即公司法所规定的转让不包括交易之外的事由导致股权主体变更的情形。我们倾向认为，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或者章程明确限制的情形下，都应允许其他股东在股权主体发生变更时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法在规定股权转让有关内容时，亦在该部分讨论继承引发股东资格变更的情形，并进行例外规

定，即公司章程没有限制的情形下公司法亦不以允许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方式限制股东资格继承。既然继承引发的股权变更亦属于交易之外的事由导致股权转让的情形，所以体系解释的视野下，没有理由将转让仅限定为因交易产生的转让情形，还应包括因继承、离婚等产生股权主体变更的情形。对于章程没有限制转让但公司法亦没有明确排除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为维护公司人合性，应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三条对夫妻离婚时一方名下公司股权处分处理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定显示，除非配偶也是公司股东时不存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如配偶并非公司股东时，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至于该情形下同等条件如何确定，因涉及夫妻关系等身份因素，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涉股权进行价格评估后合理确定同等条件。涉及股权价格确定后，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向股东配偶支付对价后可取得公司股权。

（5）股东将股权对外赠与时，其他股东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可在同等条件下主张

优先购买权。该处的同等条件包括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实践中部分观点认为，股权赠与的情形下，双方并不存在交易对价，因而不存在同等条件，其他股东不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法律规定的对外转让并未明确排除股权赠与的情形。夫妻离婚时股权转让亦非股权对外交易，但相关规定亦明确夫妻离婚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也享有优先购买权，所以不得以有偿转让的发生作为优先购买权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且侧重于人合性，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正是立法者为了维护公司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所作出的保障性规定，所以如股权赠与时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新加入股东与其他股东未必能良好合作，势必影响公司人合性。其他股东主张名为股权赠与实为有偿股权转让，也将会负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实践中难以操作。综合上述因素，我们认为股东对外赠与股权时，其他股东能行使优先购买权。至于该情形下同等条件如何确定，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涉股权进行价格评估后合理确定同等条件。涉及股权价格确定后，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可根据股东的指示将对价支付给股权受赠人后取得公司股权。

（6）对赌协议项下触发回购条件时其他股东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投资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中常用的投资方法。对赌条款是投资方为保障资金安全及利益的最大化所设定的投资条件，在目标公司未完成对赌目标时多设定以股权回购方式要求对赌方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实质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股权转让是对赌方在对赌失败后被动性受让投资方股权的合同约定，应属有效。

对赌股权回购不同于一般股权转让，一般不宜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则对其进行限制。一方面，其他股东主动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能性较低。对赌协议约定股权回购条件，投资方决定要求对方回购股权前，也会对其继续持有股权的利益与要求回购后享有的利益进行对比，只有在后者大于前者时才可能要求回购。彼时，股权价值往往大打折扣，投资方选择回购才符合其客观利益，同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不符合其客观利益。另一方面，投资方基于投资协议成为目标公司股东时，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对其投资目的及对赌协议往往是明知的，即使对赌协议约定的对赌主体非目标公司股东，也可推定目标公司

股东对于对赌失败后投资方转让股权的行为是知晓并同意的，因此，即使受让主体为股东之外的第三人，也视为目标公司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法言 | 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应重视——摘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供稿：延庆法院、北京一中院办公室

作者：王薇、何倍泽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因法律风险意识薄弱、治理水平不足等原因引发大量法律纠纷。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随机抽取 2022 年至 2024 年全国法院审理涉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案件 1000 件，经调研，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存在四方面法律风险应予以重视。

一是民营企业股东矛盾激化易引发“公司僵局”

股东矛盾在民营企业的初创、发展甚至清算过程中都有存在。部分企业因股东矛盾激化升级，甚至出现抢夺公章、营业执照等争夺公司控制权、发起诉讼解散公司的情况。调研显示，民营企业公司治理

纠纷本质上是因股东之间不和所致，主要发生在参与公司经营和不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之间，此类案件占比高达 30%。因民营企业多存在企业所有权及经营权未分离、财务信息不透明、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易导致股东对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认识存在混淆、其他股东对负责企业经营管理股东缺乏信任、公司股东议事规则失效等情况出现，产生并加剧股东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二是“挂名”“代签”问题频发成民营企业发展“暗雷”

挂名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一般为实际出资人为规避法律规定或特定风险而设置，多数挂名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因人情压力或事先承诺的利益而同意挂名。一旦企业出现债务问题，挂名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与企业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往往引发一系列法律纠纷，给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外，部分民营企业还存在股东会决议“冒名”代签的情况，严重损害公司及相关股东的正当权益。

三是企业用章管理不当成企业内部治理“真空地带”

部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因企业架构简单、人员交叉任职，往往未建立严格的公章管理制度，公司印章保管、审批、使用等较为宽松。结合调研案件，围绕企业用章产生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

类纠纷是确认印章所盖文件是否属于公司的意思表示，另一类是关于争夺印章控制权产生的纠纷。上述 1000 件案件中，因公章管理不当引发的民营企业法律纠纷约占 10%。

四是融资法律风险高成民营企业发展“双刃剑”

当前，中小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部分企业因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在债务性融资和权益性融资过程中产生较多法律纠纷，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在涉及民营企业融资的 600 件案件中，主要涉及融资租赁、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问题，其中融资租赁案件占比为 43%，成为民营企业融资法律纠纷的重灾区。

为解决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法律风险问题，笔者建议：法院通过发布指引手册、送法进企业、定期开展培训等途径，强化公司内控管理，帮助民营企业健全全流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民营企业进一步规范公司股权结构、组织架构、融资行为，合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协同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等主管部门，规范民营企业的登记、财务管理及经营行为，以司法建议等方式参与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工作；在涉民营企业案件中充分发挥商会调解优势，建立民营企业调解室，将诉调对接的“调”围绕审判职能再延伸，推动民营经济领域

纠纷实质性化解。

三、实务研究

股东有权基于公司与相对人签订的 仲裁协议提起代表仲裁吗？ | 至正 -案例分析-摘自“上海二中院”微 信公众号

股东是否有权基于公司与相对人签订的仲裁协议提起代表仲裁，对此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本文结合一则具体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该案例入选 2024 年度上海法院“100 个精品案例”。

该案裁判观点认为，公司与相对人签有仲裁协议，表明公司与相对人均有受仲裁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股东提起代表仲裁，意味着股东以其行为作出了接受仲裁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此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及于股东。股东有权依据公司与相对人签署的仲裁协议提起代表仲裁。

案 情

（2024）沪 02 民特 181 号

审判长 李迎昌

审判员 高增军

审判员 赵 炜

法官助理 贾妍彦

2021 年 8 月 9 日，上海某企业管理公司、上海某物业公司与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以及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周某某签订了《合伙权益转让协议》，并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合伙权益转让协议》中的第 20.1 条约定：“由于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索赔、分歧或争端，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续、效力、解释、履行、违反、终止或无效后果的争议以及关于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非合同义务的争议应当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通过仲裁最终解决。”《补充协议》就争议管辖未作出不同的约定。

第三人某集团公司持有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 49%的股权；第三人某控股公司（以下简称某控股公司）持有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 48.9940%的合伙份额。

2024 年 1 月 3 日，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分别代表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作为申请人，以上海某企业管理公司、上海某物业公司、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周某某作为被申请人，向上国仲申请仲裁，请求仲裁庭依法裁决：1. 上海某企业管理公司、上海某物业公司、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周某某连带地以“投资额+12%复利”的补充回售价格

*99.99%的金额回购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持有的上海某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2. 上海某企业管理公司、上海某物业公司、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周某某连带地以“投资额+12%复利”的补充回售价格*0.01%的金额回购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上海某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3. 上海某企业管理公司、上海某物业公司、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周某某连带地向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赔偿与本案仲裁相关的所有费用；4. 本案仲裁费由各仲裁被申请人连带地承担。

上国仲受理了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的上述仲裁申请。

另查明，本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审理过程中，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就案涉《合伙权益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自行向上国仲提起仲裁申请，请求当事各方继续履行协议并主张延期履约的损害赔偿责任；上国仲目前已经立案受理。

周某某向法院申请请求：确认其与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以及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上海某企业管理公司、上海某物业公司签署的《合伙权益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就争议解决方式约定的仲裁条款对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没有约束力且不适用。

裁 判

上海二中院认为，本案当事各方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能否依据案涉《合伙权益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向上国仲提起股东、合伙人代表仲裁申请。

经查，案涉仲裁案件系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分别基于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东身份以及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身份而提起，应参照适用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规则。据此，周某某主张应由人民法院依法管辖；且认为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亦均非案涉《合伙权益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不应适用协议约定的争议管辖条款。但问题是，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作为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东以及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基于各自诉权来源于所持股权公司及合伙份额企业的考虑，自愿接受所持股权公司及合伙份额企业与其他案涉协议各方约定的仲裁解决争议的条款约定，就依法应归属于天津某资产管理公司、天津某投资合伙企业的法律后果亦即权利义务，行使股东、合伙人代表权，向上国仲提出仲裁申请，属于其各自意思自治以及权利选择的范畴和事项。况且，我国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并未作出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合伙人代表诉讼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某集团公司、某控股公司是否已经完成行使股东、

合伙人代表权的前置条件的问题，依法属于案件实体审理的范围。此外，本案中周某某的申请理由亦不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

上海二中院裁定，驳回周某某的申请。

评 析

我国现行仲裁法对于股东能否提起代表仲裁未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争议。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合伙企业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该公司、合伙企业与对方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对其有效。”然而，2024 年 11 月 8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草案）》中删除了上述条款，两版仲裁法修订方案的变化体现了股东代表仲裁相关问题的争议。

一、股东代表仲裁的现行规则与理论基础

（一）观点分歧与现行制度规定对于股东是否有权提起代表仲裁实践中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依据仲裁法第四条，“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之规定，公司与相对人签订仲裁协议，股东并

非该协议的签约主体，因此不受该仲裁协议的约束亦无权依据该仲裁协议提起股东代表仲裁。仲裁的“契约性”系其本质特征，故在现行法上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仲裁协议不得随意扩张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起的诉讼，胜诉后的法律后果归于公司，因此，股东代表公司针对相对人提起的诉讼受公司和相对人之间合同管辖权条款的约束。

（二）目前股东代表诉讼受仲裁协议的制约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从各地法院出台的各类司法指导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问答中均可以体现，举例如下：

1.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裁判指引》第三条规定：“公司与他人有书面仲裁协议，股东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对他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股东诉讼指引》第五条规定：“与他人有书面仲裁协议，股东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提起股东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答网精选问答（第十五批）——立案受理专题》中，问题3为“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仲裁协议有无约束力？”该问题的答疑意见为：“在其他责任主体对公司负有违约之债或者侵权之债时，如公司怠于或者拒

绝提起诉讼，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应当根据其基础法律关系属于合同纠纷或者侵权纠纷来具体判断。如果案件是侵权之诉，一般无事先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但是在合同之诉中，如果公司与他人事先订有书面仲裁协议，股东就该仲裁协议约定仲裁的事项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告知其依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三）股东代表仲裁的法理基础——仲裁协议效力扩张仲裁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解决纠纷的程序，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仲裁协议原则上仅约束协议签署主体，不能约束第三人。随着合同法的发展，合同相对性原则发生了一些例外，同样的为了实现仲裁高效解决纠纷的商业需求，仲裁协议的效力也在一定程度突破了相对性，此即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现行法上比较典型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情形有，主体发生分立合并时继受主体受原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自然人死亡时仲裁协议对继承人有效，债权债务转让时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

与股东代表仲裁的争议类似，实践中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是否适用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理论，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为此，2023年12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主管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或者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就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中止代位权诉讼。”该条第一句明确规定仲裁协议不能排除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权利。该条司法解释的制定者认为，我国代位仲裁存在制度障碍，民法典并未规定债权人可以代位申请仲裁，债权人与相对人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如坚持要求债权人提起代位仲裁，缺乏程序法保障。那么，同样的解释路径是否也可以适用于股东代表仲裁的争议中，从而否定仲裁协议效力在股东代表仲裁情况下的扩张适用？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理由在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两段法律关系，除非两段债权债务关系中都约定有仲裁协议且仲裁协议之间不存在冲突，否则就难免存在侵犯意思自治的情况。而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并非是公司的债权人，股东是基于其股权对侵害公司利益的主体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诉讼利益最终归属于公司。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表明公司与相对人均有受仲裁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此时股东选择提起代表仲裁，意味着股东也以其行为作出了接受仲裁协议约束的意

思表示。虽然股东与公司、相对人之间没有签署书面的仲裁协议，但是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因此股东受仲裁协议的约束，并未与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

二、实务中的两点争议问题

实践中，无论股东选择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或向仲裁机构提起股东代表仲裁，相对人都可能提出主管上的抗辩。若股东选择仲裁，相对人以股东并非仲裁协议签约主体为由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撤销仲裁裁决等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股东选择诉讼，则相对人可能以其与公司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相对人提起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通常存在以下两点争议问题：

（一）相对人向法院申请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是否约束提起代位仲裁的股东，此类申请是否属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根据《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九十条，此类案件应属于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受案范围。

（二）股东是否履行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是否符合提起代表诉讼的法定资格，是否属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前应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董事会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除非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对此股东应承担证明责任，否则法院可能裁定驳回起诉。但是，对于股东代表仲裁的程序要求和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在此情况下如果参照适用上述规定，那么股东是否履行前置程序、是否符合相应持股比例及持股时间的要求是否属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查范围呢？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相关规定通过法律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相应权利，其中股东是否履行前置程序及是否符合主体资格应系实体审理的范畴。法院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时应严格遵循程序审查的原则，充分尊重仲裁机构对于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的权利。因此，股东是否履行前置程序不应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予以审查。

吴慧琼：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问题解析 | 衡石·观点一摘自 “上海一中法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吴慧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法学硕士

目录

01 案例选编

案例一：“对赌协议”失败后股权回购是否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

案例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案例三：股东优先购买权成立条件的认定

02 衡石观点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认定规则

★出让股东的通知及同等条件的认定规则

★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

03 应用规则

股权转让纠纷是公司法纠纷的主要类型之一。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其对公司所有之股权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继受取得股权而成为公司新股东的法律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主要涉及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约定的合同属性，即当事人通常是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转让股权。二是法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即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于外部受让方购买该股权的权利。三是股权转让前后手的出资责任，即股权转让人转让时尚未出资完毕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其与受让人对公司的出资责任。由此不难看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既有意思自治的一面，同时也因涉及公司其他股东、外部债权人等多方利益而有一定的公法调整色彩，故而司法实践所确定的审理思路强调以合同自由和财产转让自由为原则，兼顾限制性法律规定和公司内部约定，妥善保护当事各方合法权益并注意维护公司外部交易安全。

01 案例选编

案例一：“对赌协议”失败后股权回购是否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

B 公司、C 系目标公司股东，2016 年 1 月，A 公司与 B 公司、C 签订《增资协议》，约定：A 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向目标公司

投资 1500 万元，并约定若目标公司 2016 年净利润未达到 1,000 万元，A 公司有权要求其余各方全部或部分回购其持有的股权，B 公司、C 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后，目标公司 2016 年的净利润未达到 1,000 万元，故 A 公司诉至法院，以目标公司未完成对赌目标为由请求判令 B 公司、C 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B 公司、C 辩称，“对赌协议”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现各方对股权回购存在争议，故应按持股比例承担股权回购责任而非共同责任。

法院认为

B 公司、C 应当按约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对于回购责任的承担方式，因股权回购是在对赌失败的情况下对赌方被动受让股权的行为，具有消极性，与一般股权转让的积极性不同；对赌失败后的回购责任系全体股东协商确定的结果，其特征为投资方成为股东后的再行转让行为，仅涉及股权在股东内部间的转让，与向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不同，系约定权利。而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前提条件为股权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流转，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可享有法律规定的优于他人的购买权，系法定权利。股权回购与股东优先购买权在适用条件及法律特征上均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本案股权回购争议不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审查。本案中，协议约定 B 公司、C 对股权回购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担保，故 B 公司、C 应连带支付原告 A 公司股权回购款。

案例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D 公司股东有李某西、黄某、马某、黄某强、吴某刚，其中马某出资数额 75 万元，出资比例为 15%。马某于 2016 年 1 月将其股权出质给 E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质押登记。2017 年 2 月马某（出让方、甲方）与梁某武（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马某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梁某武。

甲方承诺：其本次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上无任何抵押、质押，并免遭任何第三方追索；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2）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协议有马某、梁某武及公司股东李某西、吴某刚、黄某强签名捺印，并加盖 D 公司印章。而原股东黄某在协议签订前去世，其继承人经法院确认继承黄某的股权，但一直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书。又因梁某武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要求马某办理转让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但马某一直未予办理。梁某武认为马某违背其协议约定的义务，故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转让款。

法院认为

马某向梁某武转让股权，经签字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相应股东不表态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协议效力。马某所持股份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质押给他人，现无证据证明债权人同意转让，股权转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据此，梁某武诉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法院予以支持，并判决马某退还梁某武已付的股权转让款。

案例三：股东优先购买权成立条件的认定

丁某某与瞿某某等九人为 F 公司股东。2006 年 9 月 10 日，F 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专题讨论公司股权转让问题，与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个人所持股份以全部转让的方式、以 1:1 的价格转让给第三方，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均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瞿某某在该股东会决议上注明：其决定优先受让（购买）其他股东转让之股权（股份）。同日，瞿某某分别与 F 公司其中五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首款作为定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付清余款。

该月 30 日，股东丁某某等三人将其与非 F 公司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寄发给瞿某某，履行股权转让的同意程序和优先购买程序，并限瞿某某在三十日内作出书

面答复。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并约定受让方交纳保证金等内容。瞿某某则复函主张其优先购买权已于 2006 年 9 月 10 日形成，要求丁某某等三人按瞿某某与其他五位股东的约定转让股权。

此后，丁某某等三人均复函拒绝瞿某某的所述条件。瞿某某遂于 2006 年 10 月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瞿某某对丁某某等三人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在 2006 年 9 月 10 日已经形成；丁某某等三人履行将其股权依法转让给瞿某某等义务。

一审判决认为

优先购买权的前提和基础为“同等条件”，瞿某某主张的转让条件低于第三方的交易条件，故其无权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驳回瞿某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认为

股东会材料包括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稿，相关条款约定明确，故应认定瞿某某已行使优先购买权，且股权购买的条件也基本确定，有相应的依据。二审改判支持瞿某某对丁某某、李某某、冯某某持有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再审判决认为

再审判决认为股东会结束签署决议时，对外转让的受让方未确定，股东行使优先

购买权的前提未成就。二审判决以此作为证明9月10日股东会上讨论过具体交易条件的依据不当。法院最终驳回瞿某某的诉请。

02 衡石观点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认定规则

新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八十四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作出了一般规定。分为两种情形：

1 股权在公司内部的转让，即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作限制；

2 股权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法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因此，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与股东与非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存在差异。

而就股权回购而言，一般系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受优先购买权规则的限制。如案例一中 B 公司、C 均系公司股东，其回购 A 公司股权不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审查。我们重点就实践中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进行论述，法院一般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股东身份以及优先购买权限制约定的查明。具体而言，需要查明原告起诉时是否具有案涉公司的股东身份，且其股东身份享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未被取消。

例如，优先股东因未足额缴纳出资被限制优先购买权等。此外，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有特殊规定的，则原告起诉要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内容。例如，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时可以不履行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程序，股东可以随意安排其股权的对外转让等。

是否有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查明。实践中，一般原告会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主张其未收到股权对外转让的通知，不知道股权对外转让的事实；另一种是主张知道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并积极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其权利未得到保障，如案例三中瞿某某即主张其 2006 年 9 月 10 日已形成的优先购买权未得到保障。对此，首先要查明转让股东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明确告知其转让的基本条件等。其次要查明请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事实的具体时间，如案例三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即为 9 月 10 日的股东会是否已披露了相关第三方购买股权的信息。原告应当证明其有积极主张购买的行为。如果股东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后，很快就向转让股东声明购买，或者多次主张购买，或者有履行行为，采取将股权转让款划到公司账户提存等方式积极表示购买的，应当认定为转让股东积极主张购买，未放弃优先购买权。

如果股东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后，采

取观望的态度,对是否购买股权态度暧昧,表明购买后又躲避与转让股东协商或者拖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等,关于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经常发生变动,对是否购买股权犹豫不决。对这种表意不明确,待价而沽,见股权升值或者有利可图后即主张行使权利,应当认定其对购买股权态度比较消极,结合案件中的其他事实,可以推定其放弃了购买权利。

优先购买权能否实现的查明。如果股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能恢复到转让时初始状态的,不宜再支持关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例如,有的是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有的虽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但受让方已经与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合作,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对公司投资等有重大贡献,其退出还是保留公司股东地位不仅涉及其自身权利,还涉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涉及公司关系的稳定。

因此,在股权变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公司其他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不宜再支持其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对此进行了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

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此处一年的规定主要考虑股权发生变动后较长时间内,新股东已参与公司管理决策,再恢复至转让前的初始状态,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出让股东的通知及同等条件的认定规则

通知形式、内容及反馈时间。

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明确了出让股东发出通知的形式、内容及反馈时间。

首先,关于通知的形式。新公司法规定转让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载明股权转让的有关内容并通知给公司其他股东。实务中,转让股东可以单独向各个股东发出书面通知,也可以采取请求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方式,在股东会中通报。针对实践中未采用书面形式,是否会导致股权转让无效的问题,笔者认为该条规定的书面形式应当解读为倡导性规定,不排除股东以其他方式进行的通知。例如,利用电话、电子信息、委托第三人通知、公告通知等。在此提醒,对其他形式的通知,最好有一定的载体,当发生争议时亦可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其次，新公司法对通知的内容进行了明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如案例三中，2006年9月10日虽已召开股东会，但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稿在股权转让的具体价格、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处为空白，因此不能作为瞿某某优先购买权成立的证据。该内容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相呼应，即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所规定的“同等条件”时，应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最后，关于征求意见的反馈时间，公司其他股东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回复，三十日届满后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该规定沿袭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九条的规定，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买请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确的，以通知确定的时间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从缔约合同的角度看，三十日是请求是否缔约合同的一个时间，并非完成交易的期限。

同等条件的认定。“同等条件”一般是指转让股东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全部内容。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一种主张绝对同等，即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必须接受股权转让合同的全部条款，

包括数量、价格、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另一种主张相对同等，即价格应完全相同，其他内容，例如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可以作为辅助条件，只要差异在合理的范围内，应当允许调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对此，笔者认为解读为绝对同等比较准确，如案例三中对于“同等条件”的认定即采绝对说。优先购买程序中更侧重的是保护转让股东利益，对转让股东在向公司以外的人转让时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此等利益亦可获得保障。

对同等条件的理解，如果是可以调整的，因在该阶段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他人往往已达成转让合同的全部条款，甚至是签订的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显然此时的调整，是根据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意志所作的调整，故极可能对转让股东是不公平的。

而对于公司以外的受让人来说，公司法的规定是其合理的预期，在同等条件下存在被他人优先购买的可能，如果公司其他股东降低了购买条件，又达到了抢先购买的目的，没有法律依据，使买受人承受更多的不可预测情形，亦失去了交易秩序

中的公平，不利于交易市场的资本流动。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其他股东享有的是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而不是其他特权，股东以外的他人拟受让股权时，其合理的利益应当依法得到保障。

★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必然会在出卖人、第三人、优先权人之间成立两个合同，形成在同一股权之上的“一股二卖”局面。其中，在未遵守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转让人与第三人在先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产生了较大争议。主要存在无效说、附法定生效条件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以及相对无效说等观点。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对侵犯优先购买权作出了具体规定，支持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并规定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虽然该条没有明文规定在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但从文义来看，如无其他无效事由，应该也认定有效。

为减少争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条对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予以明确：审判实

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以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准确理解该条规定，既要注意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要注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方面，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当其在规定时间内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

另一方面，为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在股权转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公司以外的受让方能否实现其合同项下权利取决于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即在公司股东放弃优先权利的情形下，公司以外的受让方关于股权交付和登记的请求权利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公司其他股东没有放弃购买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受让方关于股权交付及变更登记的请求就很难实现。

因此，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债权法律关系，当其合同不能得到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双方当事人均可以根据《民法典》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行使其他请求权，例如，解除合同，返还支付的对价、赔偿损失、承担违约责任等，如案例二中原公司股东的继承人一直就优先购买权是否行使未予表态，这种不表态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但考虑股权转让前争议股权已被质押，导致受让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法院故而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权的公司股东以外他人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3 应用规则

通过以上论述，希望大家能够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审理规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有限责任公司是封闭型公司，所有股东对公司是共有权利人，因此，股权转让时应当照顾共有人利益，保障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了避免发生争议，在此需要提醒的是：

1 尽量告知转让股权合同的全部内容或者合同主要条款。2 最好写明其他股东的答复期限，便于其他股东决策。3 可以明确告诉其他股东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当然对于转让股东未予告知的，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如因其泄露造成转让股东或拟受让股



四、实务论道

新《公司法》下股权转让人的注意义务边界探析

北京市兰台（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徐红梅

【撰写背景】

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中关于公司股权转让人的规定，令众多转让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上一篇写了新《公司法》下股权受让人的注意义务边界探析，本篇从转让人的角度来探讨股权流转的义务边界。

【分析阐述】

新《公司法》第 88 条规定股东在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时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内容如下：

受让人的出资义务：股东转让已经认缴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时，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的义务。

转让人转让已认缴的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按期缴纳出资的义务。新《公司法》明确了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责任义务的承担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公司股东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权益保护问题。股权转让中，如果受让

人受让了转让人已经认缴但并未届出资期限的这部分股权，则按期缴纳足额出资的义务当然对受让人发生约束力。

转让人的补充责任：如果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股权的流转（无论对内转还是向外转），均以保障公司的资本充实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为大前提。对于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转让后，受让人未能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将对于未足额缴纳的这部分股权向公司承担补充责任。也就是说，公司无法从受让人处获得足额出资的，此时，转让人仍需承担补足缴纳出资义务。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 2024 年 7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未届出资期限而发生股权流转的行为，对于新《公司法》公布实施之前的未届认缴出资期限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直接适用该条款的规定。

转让人的连带责任：如果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这是股东对公司应承担的基本义务。转让股东未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出资发生转让的，如果转让

人在转让股权时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况，且受让人在受让股权后也未对此足额补缴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则将对届期未足额缴纳的出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转让人作为原公司的股东，有义务确保其在转让股权前向公司足额缴纳的出资义务；作为新股东的受让人在受让部分的未足额缴纳的股权向公司承担足额出资义务。

提示：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确保所转让的股权全部完成足额出资义务，未完成而转让的，受让人在明知未足额出资的情形下接受转让的，对接受的这部分未足额缴纳的股权承担连带补足缴纳责任。

注意：对于 2024 年 7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转让行为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精神公平公正地处理此类纠纷，不当一概而论地向前追溯转让人对未实缴出资却已经转让的股权承担补充责任。

新《公司法》第 88 条旨在保护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防止股东通过股权转让来逃避出资义务。在认缴制下，股东在公司章程中可以约定比较长的出资期限，实务中不利于公司正常运营及业务的开展，同时给公司债权人带去极大的不稳定性。第 88 条明确了股权转让后的出资义务，是为确保公司资本的充实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转让人在股权转让中需要注意到的核心义务是：确保受让人能够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并在特定情形下受让人对于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或连带责任。

确保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的义务。新《公司法》第 88 条，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尚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时，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转让人需要确保受让人在接受这部分股权时明确并同意这一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以避免后期受让人接受股权后出资不到位给公司和债权人造成困扰的问题。

【结语】

无论是股权转让人，还是股权受让人，都应当信守承诺按约履行自己向公司认缴的出资义务。股权流转完成后，受让人应当及时向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受让股东的姓名/名称、住所及所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同时公司章程作出相应调整。

注意：转让人在股权转让时应当注意其合法性、合规性。严格遵守法定的股权转让流程，确保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发生的有关税费依法缴纳。避免因股权转让行为因不合法、不合规而引发法律风险带来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作者简介：徐红梅

北京市兰台（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司治理牵头人、青工委主任、党支

部副书记

上海市科创中心创业导师；人民调解员；上海市女律联民法典宣讲员；上海安徽经济文化促进会淮北分会理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安徽经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淮北分会青才联执行主席；上海市律师协会公司与商事专业委员会连续三届委员；仲裁员；《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律师；企业合规师。

编撰过《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新冠疫情下公司治理业务指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优化营商环境调研报告》《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草案）》等法律法规和《公司治理律师实务》一书的撰写及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几十家国企关于《上海市国有混合所有制涉公司类纠纷法治体检报告》《中小企业合规评价认证混合所有制涉公司类纠纷法治体检报告》团体标准起草人。

多次做客上海电视台、上海广播电台、上海市浦东电视台录制法治类节目。2017年做客央视春晚上海分会场及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节目录制。受邀参加录制区长面对面访谈栏目；受邀录制上海市浦东广播电台“新乡的那片雪”法制栏目；受邀录制上海市广播电台的“940 小超人”法治节

目。

获得荣誉：全国优秀公益律师；上海市律协公司与商事业务研究委员会连续多年荣获“履职先进奖”“履职优秀奖”“履职卓越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公益律师；上海市静安区优秀党员学习标兵；“铿锵百玫瑰 初心述芳华”上海百名党员女律师代表之一；多次收到当事人家属赠送的锦旗、水晶杯等。

